

XU

JI

LIN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自

选

集

许纪霖 著

跨世纪学人文存

许纪霖

自选集
许纪霖著

“九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 广西师范大学

跨世纪学人文存
许纪霖自选集
许纪霖 著

责任编辑：肖启明
郑纳新

封面设计：敬人设计工作室
吕敬人 张朋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邮政编码：541001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36 号)

桂林市印刷厂印刷

*

开本：889×1194 1/24

印张：17.25

字数：396 千字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7-5633-2775-4/K · 117

定价：29.50 元

出版说明

一代有一代之学术，一代有一代之学人。学术所依托者，学人也。学人须由学殖养成，非纯由天资铸就。学殖者渐，天资者顿，而学术的规律是“渐”的。基于这个“渐”的规律，出版人便有义务在当代学术的积累与整理上做一份工作，以助成学术之进步。这是我们出版此丛书的初衷。

新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以来，中国学术界涌现出一批新学人。他们大多有过对社会动乱与变革的体察，受过“西风”渐欲迷人眼的种种思潮的冲激，有过放眼望洋的蹈厉，亦有过躲进小楼的沉潜。他们在80年代初崭露头角，继而渐趋成熟。90年代以来，这批学人更以一种成熟的心态，对新世纪的学术前景作了从容的思考。由此我们也就有理由期望他们在步入下一个世纪的时候，成为新世纪通博的学术大家。这样的大家是现代化中国所迫切需要的。因为一个民族，在其步入现代化的时候，倘不能对自身的存在作出健全、合理的解释与肯定，那便是崩溃的开始。学人的使命，究其根本正在于作出这样的解释与肯定。我们不能在拥有了技术之后却失去了精神。这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是可堪忧心的问题。

《诗》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中国这一批新学人，多是这样的“心忧”之人，当其激切之初，曾蹈厉

于良知的煎迫；当其冷静之余，又沉潜于学理的涵泳。这样的“心忧”，是学界的好传统，也是中国学人最可宝贵的品质。他们的学术自选集，也许不一定能呈示其学术全貌，但肯定能够突出体现其宝贵的学术品质。我们出版这套丛书，就是希望这样的品质能够在 21 世纪的中国学人身上传承下去。

“跨世纪”只是一个象征的说法，并不是说未被列入“跨世纪”的人就无权迈进下世纪的门槛。“跨世纪”只是意味着，我们对新世纪中国文化的昌明与辉煌有着多么热切的期许，以及基于这热切期许而履行的对中国文化建设重任的自觉的肩负。没有这样的自觉，便没有迎接新世纪的真正准备，也就没有了开创未来的现实基础。丛书收入的，都是人文科学研究者的著述，我们想：人类存在的价值，其终极尤须以人文的尺度来衡估。

90 年代的沉潜，也许意味着中国学术界已进入了一个转型期，这样的转型是承前，也是启后。在这个重要的时期，我们出版这套“跨世纪学人文存”，旨在尽我们的薄力，倡学术之昌明。

是为说明。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部

一九九七年九月

目 录

自 序.....	(1)
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反思.....	(7)
中国知识群体的人格类型.....	(43)
入世与出世:进退维谷的两难困境	(59)
外圆与内方:近代知识分子的双重人格	(74)
超然与介入:东西方知识分子的一种比较	(90)
中国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传统.....	(98)
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参政(1945—1949).....	(110)
曾国藩:中国式的人世禁欲	(121)
黄远生:忏悔中的灵魂升华	(129)
胡 适:社会改造中的理性贫困	(140)
梁漱溟:现代中国的内圣外王	(151)
丁文江:出山不比在山清	(162)
周作人:现代隐士的一幕悲剧	(172)
翁文灏:一个科学家的错位	(186)
陈布雷:“道”与“势”之间的挣扎	(191)
毛泽东:一个伟人的思想遗产	(206)

金岳霖:走出阁楼之后	(217)
朱自清:从象牙塔到十字街头	(228)
闻一多:激情的归途	(251)
吴 晗:可怜一觉开封梦	(276)
张中晓:思想史上的又一位先知	(285)
顾 城:在诗意与残忍之间	(293)
史铁生:另一种理想主义	(300)
王小波:他思故他在	(308)
知识分子与独立人格	(320)
知识分子与商品经济	(333)
知识分子与精英文化	(341)
知识分子与人文精神	(349)
现代化变迁中的价值探寻	(355)
关于学术研究的本土化	(380)
学术规范的张力与限度	(391)
主要著述一览表	(401)

Contents

Author's Preface	(1)
A Reflection on the History of Modernization in China	(7)
Independent Type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43)
Intellectuals Pendulating between Scholarship and Politics	(59)
Round without and Square within;a Dual Personality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74)
Detachment Versus Engagement;a Perspective for Comparison between Intellectuals	(90)
The Liberal Tradition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98)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 of the Liberal Intellectuals in China (1945-1949)	(110)
Zeng Guofan;a Chinese Variety of Worldly Asceticism	(121)
Huang Yuansheng;Spiritual Sublimation through Confessions	(129)
Hu Shi;Poverty of Reason in Social Reconstruction	(140)
Liang Shuming;"Sageliness within"and "Kingliness without"in Modern China	(151)
Ding Wenjiang;Taking Office Is No Cleaner than Staying Reclu-	

sive	(162)
Zhou Zuoren; a Modern Hermit's Tragedy	(172)
Weng Wenhao; the Misplacement of a Scientist	(186)
Chen Bulei; Torn between "Dao" (Confucian Orthodoxy) and "Shi" (Political Purchase)	(191)
Mao Zedong; the Intellectual Legacy of a Great Man	(206)
Jin Yuelin; after Walking out of the Penthouse	(217)
Zhu Ziqing; from Ivory Tower to Crossroad	(228)
Wen Yiduo; Emotion's Way Home	(251)
Wu Han; Pitifully a Disenchanted Dream of Huang Liang	(276)
Zhang Zhongxiao; One More Prophet in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China	(285)
Gu Cheng; between Poetic Flavour and Brutality	(293)
Shi Tiesheng; Another form of Idealism	(300)
Wang Xiaobo; He Thinks, therefore He Is	(308)
Intellectuals and the Independent Personality	(320)
Intellectuals and Commodity Economy	(333)
Intellectuals and the Elite Culture	(341)
Intellectuals and the Humanistic Spirit	(349)
Exploration for Values in a Modernization Period	(355)
On Natualization of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380)
Tensions and Limitations of the Demands for Normativation of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391)
Catalogue of Main Works	(401)

自序

历史,总是由知识分子书写的,然而,知识分子自身的历史,却常常无人书写。个中缘由,大概是因为知识分子在中国,一直被认为是一根依附在人家皮上的无足轻重的杂毛,连独立的名分都没有,何来独立的历史?这一情形,到80年代有所改变,在文化热之中,产生了知识分子的自我反思。反思的方法有多种,其中之一就是历史的反思,于是,知识分子开始有了自我的历史。

算起来,研究知识分子历史的,在80年代我算比较早的一个。我个人之所以对知识分子的历史发生研究的兴趣(而非人人都有的谈论兴趣),起因纯属偶然。1982年我在华东师大毕业留校,系里分配给我的教学任务是中国民主党派史。中国的民主党派,在其成立之初,绝大多数都是自由知识分子的聚合。一部民主党派的历史,也不妨读作一部知识分子的历史。在当时文化热氛围的烘托下,我尝试以一种文化的视角来考察这些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考察他们在一个大时代中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转型。当时,我采用了“知识分子独立人格”这样一个中心理念,而且将这一理念作为研究转型期知识分子的主要依据。

“知识分子独立人格”这一理念在当时的知识圈里得到了相当普遍的回应,成为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自我反思的重要成果之一。不过,现在回过头来看,尽管这一理念在当时具有现实反思的充足理由,但其学理和历史上的论证依然是不充分的。何况,学术研究在起初可以为一种

意识形态的热忱所引发,但其持久的生命力应该是自恰的、独立的,而不是作为意识形态的工具。这是知识分子人格独立的学术体现。而作为学术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史,就不仅仅是一部独立人格的转型史,它还具有社会学、知识学等多种蕴涵,应该通过思想史、学术史、文学史、心态史、社会史等多学科的方法多元化地加以研究,而且是独立的、冷静的、与现实有距离的客观研究。

为了替以后的知识分子史研究打好基础,从90年代初开始,我暂别这一课题,从一个更宏观的背景——20世纪中国现代化的整体历史,来观察知识分子所凭藉的时代背景和所面临的历史问题。同时,通过跨学科的广泛阅读,调整和优化自身的知识结构,以期在一个更广阔的历史/知识背景下来理解和解读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这一调整到去年得以完成,我重新从宏观回到微观,回到自己原先的知识分子历史的研究,回到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的课题。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有过几个值得大书特书的大时代。所谓大时代,按照鲁迅的说法,“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不是死,就是生,这才是大时代”。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这样的大时代有四个:先秦、魏晋、明末清初和20世纪。在这些大时代中,整个社会面临着巨大的转型,知识分子的思想 and 人格不仅与政治环境发生激烈的冲突,而且自身也面临着巨大的矛盾。大时代的知识分子是最光彩的,也是最丑陋的;是最单纯的,也是最复杂的;是最勇敢的,也是最怯懦的。20世纪还没有结束,我们仍然置身于一个大时代之中,书写20世纪知识分子的历史,也就等于在书写我们自身。

不过,对于学术研究来说,20世纪毕竟太宏观了。这短短的一百年间,发生了多少波澜曲折,其变化动荡的程度、周而复始的更替频率,几乎等于过去十个世纪。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不是一代人,而是几代人。更确切地说,在整个20世纪中国,总共有六代知识分子。以1949年作为中界,可以分为前三代和后代,即晚清一代、五四一代、后五四一代和“十七年”一代、“文革”一代和“后文革”一代。无论是前三代还是后代,都有自己的历史中轴,那就是五四和“文革”。对历史中轴的理解,成为理解前后三代知识分子的关键问题。五四和“文革”,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历史事件,而且是一种知识的和心态的分水岭,以一种什么样的阅

历和身份经历它们，足以区分几代不同的知识分子。所谓的代沟，也往往通过重大的历史事件而得以明晰。

最初出现在20世纪中国舞台上的，是晚清一代知识分子：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蔡元培、王国维等人。他们大多出生于1865—1880年间，早年受过系统、良好的国学训练，有传统的功名，但为变法图强之故，已经十分重视西学的价值，但那些新知多是从东邻日本转手而来，常常显得一知半解。从骨子里来说，这一代人的思想模式不外乎“中体西用”。尽管如此，他们毕竟是跨世纪的一代，既是中国历史上最末一代士大夫，又是新知识、新思想、新时代的先驱。他们中的一些佼佼者如“笔锋常带情感”的梁任公，影响了整整一代五四知识分子。

1915年以后，新一代知识分子崛起了。像鲁迅、胡适、陈独秀、李大钊、梁漱溟、陈寅恪、周作人这代人，大多出生于1880—1895年之间，是中国第一代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之所以说第一代，是因为他们不再走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士大夫老路，在新的社会结构中已经有了自己的独立职业，比如教授、报人、编辑、作家等等，而且在知识结构上，虽然幼年也诵过四书五经，但基本是在不中不西、又中又西的洋学堂中得到的教育，后来又大都放洋日本或欧美留学，对西方文化有比较完整的、直接的认知。这是开创现代中国新知识范型的一代人，但在文化心态、道德模式等方面依然保存着中国传统的不少特点。

到30、40年代，又一代知识分子开始展露头角。用殷海光先生的话说，可以称之为“后五四”知识分子。这代人实际上分为前后两批，前一批出生于1895—1910年之间，他们在求学期间直接经历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是五四中的学生辈（五四知识分子属于师长辈），这代人大都有留学欧美的经历，有很好的专业训练。如果说晚清与五四两代人在知识结构上都是通人，很难用一个什么家加以界定的话，那么这代知识分子则是知识分工相当明确的专家，比如哲学家冯友兰、贺麟，历史学家傅斯年、顾颉刚，政治学家罗隆基，社会学家潘光旦、费孝通，文学家朱自清、闻一多、巴金、冰心等即是。前两代人是文化精英，主要靠社会影响出名，而这代人的声望主要局限在知识圈内。五四一代开创了新知识范型之后，后五四一代作出了一系列成功的范例，30~40年代中国文学和学术的高峰主要是这代人的贡献。后五四一代中的后一批人出生要晚

一些，基本在1910—1930年之间，他们在求学时代接受了五四以后新知识和新文化完整的熏陶，但当正将展露头角的时候，中国社会进入了历史上最为动乱的年代，一连串的政治运动耽误了他们整整三十年光阴，直到80年代以后步入中晚年，才焕发出学术的青春。

1949年以后，留在大陆的五四和后五四两代知识分子被迫接受思想改造和改变学术观点，相当长一段时期是由“十七年”（1949～1966）一代知识分子唱的主角。这代人出生于1930—1945年之间，其知识底色受到《联共（布）党史》影响极大，带有浓郁的意识形态色彩。由于反复强调与过去的资产阶级学术决裂，他们在知识传统上成为无根的一代。这代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中致力于学术研究，一直试图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规范。但如同上代人一样，他们的文学和学术生命被连绵不绝的政治运动所打断。对于这一切，其中的一些人在1976年以后有比较深刻的反思，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中吸取西方优秀的文化成果，是思想解放运动的主要参与者，直接影响了下一代人的思想成长。

到80年代中期的“文化热”，新一代知识分子崛起。这是“文革”一代人，他们大多出生于1945—1960年之间，早年有过红卫兵与上山下乡的经历，通过自学和恢复高考，具备了再度面向西方、兼容并蓄的文化目光。他们以西方最新的文学和学术成果为参照和比照，开始致力于新一轮的思想启蒙和知识范型的开拓。这代人的知识是开放、多元和博杂的，目前已逐渐成为知识界的中坚。

20世纪中国的最后一代是“后文革”一代知识分子。这代人出生在1960年以后，在他们的心灵之中，“文革”基本上没有什么烙印，思想解放运动也印象平平。而“文革”一代知识分子提倡的“文化热”却赋予了他们早年的人格底蕴。幸运的是，无论是留学西洋，还是在国内攻读硕士、博士学位，这代人都受过系统的专业训练，是新一轮的专家型学者，在上两辈学者指导下，他们目前所做的新知识范型的阐释工作，已经有了一些令人刮目相看的成果，到21世纪，中国文学或学术假如有可能形成新一轮高峰的话，这代知识分子将是颇有希望的主角。

透过上述对20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极为粗略的描述，我们可以发现在前三代与后三代之中，有一种有趣的历史轮回现象，或者说某种可比拟性。以新知识结构为例，第一代是过渡，第二代是开拓，第三代是

陈述。类似的可比拟性还体现在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方面。一般说来，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可以表现为三种不同的人生关怀：社会（政治）关怀、文化（价值）关怀和知识（专业）关怀。这是三种不同层面的人生关怀，有着由显到隐、由外向内、由入世到出世的区别。作为任何一代和任何一个知识分子，这三种关怀都是有可能而且有必要同时具备的。然而，因为社会环境、时代风气和士人心态的不同，不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往往会侧重于某个层面。对于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大致来说，第一代（晚清和“十七”年两代人）更多的是社会关怀，他们处于一个社会结构转变的前夜，考虑的重心是如何实现社会政治体制变革，因此政治意识比较强烈。而第二代（五四和“文革”两代人）更多的是文化关怀，他们对文化价值和道德重建的关心要超过对社会政治本身的关心，因此特别重视文化启蒙的工作，五四新文化运动和80年代的“文化热”都产生于第二代，并非历史的偶合。而第三代（后五四与后“文革”两代人）相对来说知识的关怀更多一些，他们已经注意到文学或学术自身的独立价值，不是在意识形态或文化价值的意义上，而是在文学或知识自身的立场上思考各种问题，因此第三代对社会的、文化的贡献远远不及前辈，但其知识的贡献却不可限量。

六代知识分子的兴亡更替，几乎浓缩地折射了20世纪中国的全部历史。每代知识分子都是一个很大的研究课题，值得历史学家去书写。不过，我以为，目前真正进入“历史”的还只是前三代知识分子，而后三代知识分子仍然参与着当今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自身还继续处于流变之中。他们尚未构成“历史”，仍是“当下”的一部分。后三代知识分子，远未到盖棺论定的时候，他们只是文化评论的对象，而非文学史、思想史、学术史或心态史的研究对象。历史研究，总是以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一定的时空距离为前提的，而这样的前提，暂时只有前三代知识分子已经具备。

所以，作为一个史学中人，我的下一部工作，仍然将围绕着前三代知识分子展开。尤其是五四与后五四两代知识分子的心态史，成为我个人特别关注的课题。我觉得，文学史、思想史或学术史所处理的主要是研究对象所留下的文本，是对文本本身的解读。但一个知识分子更深层的东西，比如他的心态人格、行为模式、个人无意识（乃至集体无意识）

又岂是文本自身所能解读得了的!这就需要用心态史的方法加以阐释,将表层的文本表述与深层的心理意识、内在的思想活动与外部的行为方式综合起来研究,进而对知识分子的历史有一个更深层的理解,有一个现代的阐释。这样的工作既吸引人,也富于挑战性,我愿意继续尝试着做下去。

最后,对编选原则再交待几句。一个学人到了可以编自选集的时候,大凡已经是著作等身,功成名就了。说来惭愧,我的年龄,还刚刚踏入不惑之年,学术生涯也不过十来年的光景。在寥寥几本书和几十篇习作中,要“自选”几篇还算说得过去的,未免有点勉为其难。十几年来,我的研究主要有三个,一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二是中国知识分子研究,三是当代文化批评。在这三项研究之中,如果说还有点特色的话,也许有关知识分子的文字算是勉强及格,尚可一读。所以,这本自选集重点选的是这方面文章。除此之外,还选了个别与知识分子研究有关的背景性论文,如对中国现代化历史的宏观理解、对文化与学术一般问题的讨论等。本书所收的文章,大部分在海内外的杂志、文丛中发表过。此次收入时,为体现出某种整体感,若干题目做了重新调整,并且恢复了原来被删节的文字。但为尊重文章的原生态,尊重自身写作的历史,即使某些观点如今看来颇有修改的必要,也仍然保持原状,未作任何改动。

1997年1月初稿

1998年3月改定

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反思

在我们所要论述的 1840—1949 年这个时间段落中，古老的中国经历其开天辟地以来最为惊心动魄的冲撞和变迁。现代化的变迁与受挫构成了整个历史的中心图景。希望与失落、亢奋与冷漠、突变与回归……交织成一幅幅交替显现的戏剧性场面。千年循环的历史终于摆脱了“治”、“乱”相替的怪圈缠绕，走向了全球性的现代化浪潮。

现代化变迁，是这一个世纪历史演化的主轴，也是错综复杂现象表层下面蕴含着的历史底蕴。不过，当我们回过头来检视这段历史，都会承认现代化的目标并没有在近代中国实现，比较与中国几乎同时起步的邻国日本来说，差距是极其明显的。为什么中国现代化是这样的步履艰难，在这一个世纪中，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迁、是什么因素阻碍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这是本文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

一、中国现代化的基本问题

（一）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主题

美国比较现代化学者布莱克(C. E. Black)指出：在人类历史中，有

三次伟大的革命性转变。第一次革命性转变发生在一百万年以前,原始生命经过亿万年的进化以后出现了人类;第二次革命性转变是人类从原始状态进入文明社会;而第三次革命性转变则是近几个世纪正在经历中的事,全世界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国家从农业文明或游牧文明逐渐过渡到工业文明。^①

我们将人类历史上这第三次大转变理解为现代化。现代化在这里是一个活生生的动态性观念,它与现代性有所不同。现代性所指的是这个概念所象征的工业文明结构中内涵的各种静态性要素,而现代化则意味着一种历史的连续或时间的过程,是一个当代世界仍然在持续着的历史变迁。

从全球范围来看,人类的第一、二次大转变是在各个地域或各个民族相互隔绝、彼此孤立的状态下个别实现的,而第三次大转变的情形恰恰相反。由于知识爆炸、科技进步和工业革命所提供的客观要素,使现代化具有世界性的弥散和扩张性质。它在地球的某一区域首先突破,随后伴随着血与火强行扩张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部落。历史也确实如此。现代化最早是从西欧开始突破,随后向欧洲腹地及北美扩展,最后又通过殖民化扩散到南美、澳洲、亚洲和非洲广大地区。由于具有这样的历史背景,现代化又被称为工业化、欧化或西化。在一般的意义上,这些概念是等值的。但现代化较之西化、欧化或工业化这些概念有着更丰富、更深刻的内涵。首先,现代化不是一个简单的向欧美国家的认同过程,其间必然蕴含着每个国家或民族在各自的历史文化视野中对现代化的不同价值取向和模式选择,这就使现代化的道路呈现出某种开放和多元的性格。其次,现代化也不仅仅是生产方式的转变或工艺技术的进步,它是一个民族在其历史变迁过程中文明结构的重新塑造,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诸层面的全方位转型。

关于现代化发展的一般阶段,国外学者有不少理论假说,比较著名的有罗斯托(H. Rostow)提出的经济成长五阶段论和布莱克的现代化发展四阶段说。相比较而言,布莱克的假定更具有普遍性。他认为,所有现代化国家都必定面临以下几个阶段:第一,现代性的挑战——现代

^① 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一个比较史的研究》,中译本,1—4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